

试论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时代与地域分布特征

——兼谈其方言地理学价值*

连燕婷

提 要：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主体语料所属时代宜限定在清康熙至民国时期，前后 300 年左右的时间；所属地域涵盖 29 个现行省份的 593 个县区，几乎遍布全国。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多、地域覆盖面广、时地标记明确、以县为主的调查单位设置科学合理，可用来绘制清代民国时期的汉语方言地图，描写该时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分布面貌，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异同，探寻汉语方言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助力汉语方言的分类与分区、方言接触演化等研究。

关键词：方志 方言 时代 地域 方言地理学

方志是记载地方自然与人文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一般以 1949 年为界，将在这前后编纂的方志区分为旧志与新志。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统计，现存旧志有 8500 多种，10 多万卷。^①在浩如烟海的旧志文献中，蕴藏着数量丰富的语言资料，其中最多的是汉语方言资料，民族语言资料次之，还有少量外语资料。所涉汉语方言资料包括官话、晋、吴、徽、赣、湘、闽、粤、客、平话等十大方言，民族语言资料包括满、朝鲜、藏、羌、彝、壮、苗、瑶、侗、水、土家、毛南、畲、黎等民族语言，外语资料有葡萄牙语、越南语等。旧志收录的语言资料大多分置两处：一处集中在“方言”专栏，一处散见于“风俗”“物产”等门目。旧志大都设有“风俗”“物产”等门目，其中载有动植物、风俗、地名等的方言叫法。这意味着其所载语言资料分布零散，且以名词特别是名物词居多，语料特色鲜明；而目前未有对此作系统整理者，其数量、时地分布情况皆未知，故此暂只讨论集中出现在“方言”专栏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

以往学界对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整理还很有限，一般仅以省为单位统计相关旧志数量，目前也只有周振鹤、游汝杰借此考察了上海地区 16—19 世纪的方言地理状况。^②近年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整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有条件对这批资料的时代与地域分布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并由此增进对其语料价值，特别是方言地理学价值的认识。

一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体量

对于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体量，以往学界一般仅就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进行统计，本文则加入篇幅这一要素，以求更加直观、全面地展现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整体面貌。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深加工语料库实践的汉语史分词规范研究”（22BYY10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年。

② 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地区 16—19 世纪方言地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 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79—292 页。

早在 20 世纪初，夏廷棫就对 68 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作了目录整理^①，但最早进行较大规模辑录影印的是日本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其整理出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 264 种。^② 近年，曹小云、曹嫫《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点校排印收录语言资料的旧志 962 种^③，其中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 879 种；李蓝《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辑录影印收录语言资料的旧志 673 种^④，其中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 611 种。两部《集成》的出版，标志着旧志语言资料的整理工作已趋完善。但在两部《集成》之外，我们仍增补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含少量其他地方文献）74 种，其中明代 5 种、清代 34 种、民国 35 种，详见表 1。

表 1 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增补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1	雍正	来安县志	伍斯瑛、项世荣	卷 6 风俗志 · 方言	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安徽滁州来安
2	民国	颍上县志	张星桥	民族书 · 语言文字	民国 32 年（1943）稿本	安徽阜阳颍上
3	民国	洮沙县志	张慎微	卷 5 文化 · 方言风谣志	民国 32 年油印本	甘肃定西临洮
4	民国	金塔县采访录	金塔县政府	卷 10 民俗类 · 各地音通习俗	民国 30 年抄本	甘肃酒泉金塔
5	民国	青城记	杨巨川	杂志	民国 27 年抄本	甘肃兰州榆中青城镇
6	民国	张掖地方志略	王辅政	方言与异词	民国修成，载《甘肃文史》2009 年第 4 期	甘肃张掖甘州
7	雍正	揭阳县志	陈树芝	卷 4 风俗	雍正九年刻本	广东揭阳揭东、揭西

① 参见夏廷棫：《本所所藏地方志中关于方言之记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 年第 85—87 期合刊本。

② 参见〔日〕波多野太郎主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横滨市立大学纪要》，1963—1972 年。按，已去除 9 种重出方志，其中乾隆《吴江县志》重出 2 次。

③ 参见曹小云、曹嫫编：《历代方志方言文献集成》，中华书局，2021 年。该书《前言》称书中共收录方志 963 种，其中上海附 1 种，江苏附 2 种。笔者将书中的民国《续修盐城县志》所附《盐城续志校补》，同治《上海县志》所附同治《上海县志札记》析出，将重出的民国《临潼县志》（实为已收的乾隆《临潼县志》的民国铅印本）、清《太平府志》（实为已收的康熙《太平府志》）、清《灵川县志》（当收雍正《灵川县志》）删除，如此统计该书共收方志 962 种。

④ 参见李蓝主编：《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该书所收方志存在重出、时代标示有误等 92 处问题，故收录总量实少于《序》中所称的 741 种，参见连燕婷：《〈中国方志中语言资料集成〉编纂指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4 年第 2 期。该文共统计出 91 处失误，尚遗漏 1 处时代标示有误的方志：第三册第 116—118 页标注的“光绪《赞皇县志》”，乃光绪二年补刻乾隆十六年刻本的《赞皇县志》，实为“乾隆《赞皇县志》”。

(续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8	乾隆	新兴县志	刘芳	卷 27 风 俗 · 语言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刻本	广东云浮新兴
9	光绪	梅菪赋志	黄炉	岁例	光绪二十二年 (1896) 稿本	广东湛江吴川梅菪街道
10	民国	同正县志	曾瓶山、杨北岑	卷 7 民 籍 · 户 口 · 种族、卷 7 民 籍 · 方言	民 国 22 年 铅 印本	广西崇左扶绥
11	雍正	平乐府志	胡醇仁	卷 20 外 志 · 方言	雍正四年刻本	广 西 桂 林、贺州
12	乾隆	庆远府志	李文琰、何天祥	卷 1 风 俗	乾隆二十年刻本	广西河池
13	民国	柳江县志	柳江县政府	卷 2 民 族 · 十一 方言	民 国 27 年 铅 印本	广西柳州柳江
14	民国	今 日 之 贵 州	京滇公路周览会 贵州分会宣传部	贵州民俗概览篇 · 婚嫁丧祭年节及其他民俗 · 民俗谚语附贵州方言	民 国 36 年 铅 印本	贵州
15	道光	黎平府志	刘宇昌、唐本洪	卷 5 地里志四 · 方言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刻本	贵州黔东南黎平、榕江、从江
16	光绪	昌化县志	李有益	卷 1 舆 地 志 · 风 土	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海南昌江
17	光绪	临高县志	聂缉庆、桂文炽	卷 4 疆 域 · 民 俗	光绪十八年刻本	海南临高
18	民国	河 北 省 概 况	河北省公署	言语	民 国 29 年 铅 印本	河北
19	雍正	直 隶 定 州 志	王大年、魏权	卷 4 赋 役 · 风 俗 · 方 音	雍正十一年刻本	河北保定定州
20	民国	易县志稿	寿鹏飞	卷 6 风 土 略 · 方 言 · 特 语、音 变	民国 26 年抄本	河北保定易县

(续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21	民国	热河新志	武尚权	第4章热河人民的生活动态·热河人民的生活习惯·热河人民的语言和信仰	民国32年铅印本	河北承德、辽宁和内蒙古部分
22	嘉靖	广平府志	翁相、陈棐	卷16 风俗志	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	河北邯郸
23	康熙	广平府志	沈奕琛、申涵盼	卷11 风土	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	河北邯郸
24	同治	枣强县志补正	方宗诚	卷4 记风土记后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河北衡水枣强
25	民国	文安县志料	文安县政府	卷2 风土·方言	民国20年抄本	河北廊坊文安
26	乾隆	行唐县新志	吴高增	卷15 艺文志·学规下·诗·作诗四则示义学生童·谐声	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河北石家庄行唐
27	民国	正定县志	冉杭、张文林	卷1 风土·方言	民国21年抄本	河北石家庄正定
28	康熙	新续宣府志	姜际龙	风俗考·附方言字义	康熙十三年抄本	河北张家口宣化
29	乾隆	辉县志	文兆奭、杨喜荣	卷3 地里·风俗·方言附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河南新乡辉县
30	民国	宝清县志	齐耀斌、韩大光	卷23 拾遗志·土话	民国25年铅印本	黑龙江双鸭山宝清
31	民国	汉口指南	武汉书业公会	第十章杂录·第二节方言志要	民国9年铅印本	湖北武汉江岸、江汉、硚口
32	民国	沅陵县志	修成浩	卷32 风俗类·语言	民国20年稿本	湖南怀化沅陵

(续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33	乾隆	益阳县志	高自位、曾璋	卷 18 风 俗 · 方言	乾隆十三年刻本	湖南益阳赫山
34	嘉庆	道州志	张元惠、黄如穀	卷 10 风土志 · 风俗 · 方言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刻本	湖南永州道县
35	光绪	宁远县志	张 大 煦、欧 阳 泽闾	卷 8 风俗 · 方言	光绪元年刻本	湖南永州宁远
36	民国	大中华吉林地理志	林传甲	第十四篇第六十章言语	民 国 10 年 铅印本	吉林
37	民国	吉林新志	刘爽	下编第三章第三节语言、第四节文字	民 国 23 年 铅印本	吉林
38	宣统	长白汇征录/长 白 征存录	张凤台	卷 4 风俗 · 语言	宣 统 元 年 (1909) 铅印本	吉林白山
39	乾隆	盱眙县志	郭起元、秦懋绅	卷 5 风俗 · 方音	乾隆十二年刻本	江苏淮安盱眙
40	民国	拼茶史料初集	蔡观明	拼茶方言一斑、拼茶方言补	民 国 25 年 铅印本	江苏南通如东拼茶镇
41	万历	如皋县志	李廷材、吕克孝	卷 3 方 俗 考 · 方言	万 历 四 十 六 年 (1618) 刻本	江苏南通如皋
42	乾隆	镇洋县志	金鸿、李麟	卷 1 封域类 · 风俗 · 方音	乾隆十年刻本	江苏苏州太仓城厢镇
43	光绪	续 纂 泰 州 志	郑辅东、王貽牟	卷 3 城 池 · 方 言 附	民 国 10 年 石印本	江苏泰州海陵
44	嘉靖	靖江县志	王叔杲、朱得之	卷 5 职制下 · 风俗 · 俗尚微言	隆 庆 四 年 (1570) 刻本	江苏泰州靖江
45	民国	无 锡 风 俗 志	钱基博	三 · 方言	《无锡县教育会年刊》1918 年第 1 期	江苏无锡梁溪
46	民国	开化乡志	王抱承、侯学愈	卷下风俗	民 国 5 年 活 字 印本	江苏无锡滨湖雪浪街道

(续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47	民国	江苏省会辑要	贾子彝	第十章社会·二. 风尚·语言	民国 25 年铅印本	江苏镇江
48	道光	崇仁县志	原步颜、袁章华	卷 3 杂志部·方言	道光元年(1821)刻本	江西抚州崇仁
49	同治	于都县志	颜寿芝、何戴仁	卷 13 艺文志·邑侯颜公香陔先生劝民息讼俚语	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江西赣州于都
50	民国	庐山志	吴宗慈	卷 7 山政·行政·方言	民国 22 年铅印本	江西九江浔阳、庐山
51	万历	铅书	笄继良、柯仲炯	卷 8 说苑·方言	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江西上饶铅山
52	同治	玉山县志	黄寿祺、吴华辰	卷 1 地理志·风俗	同治十二年刻本	江西上饶玉山
53	民国	绥远集宁县志略	许辑五	住民·语言	《西北刍议》1936 年第 1 期、第 4 期	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
54	康熙	沃史	范印心、张奇勋	卷 13 风俗考·方言	康熙七年刻本	山西临汾曲沃
55	民国	徐沟县志	刘文炳	徐沟县语言志	民国 28 年稿本	山西太原清徐
56	民国	白水县乡土志	佚名	方言	民国 13 年抄本	陕西渭南白水
57	天启	同州志	张一英、马朴	卷 2 輿地·风俗	天启五年(1625)刻本	陕西渭南大荔
58	康熙	临潼县志	赵于京	卷 5 风俗志·方言	康熙四十年刻本	陕西西安临潼
59	康熙	延绥镇志	许占魁、谭吉璉	卷 6 艺文志·方言字义	康熙十二年刻本	陕西榆林
60	乾隆	府谷县志	郑居中	卷 5 风俗·方言、土音	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陕西榆林府谷
61	道光	增修怀远县志	苏其照、何炳勋	卷 4 下方言字义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陕西榆林横山

(续表)

序号	年号	方志名称	修纂者	方言所在卷目	版本	现属省/市/区县
62	民国	嘉定乡土志	匡尔济	下册·十四·方言	民国 22 年铅印本	上海嘉定
63	民国	川沙乡土志	陈培亮	第三十六课方言	民国 7 年铅印本	上海浦东
64	光绪	江东志	佚名	卷 1 地理志·土语	光绪年间纂辑,稿本散佚	上海浦东高桥镇
65	民国	重修什邡县志	王文照、曾庆奎	卷 7 礼俗卷·社会风俗·方言	民国 18 年铅印本	四川德阳什邡
66	光绪	井研志	高承瀛、吴嘉谟	卷 1 疆域一	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四川乐山井研
67	光绪	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	邓元鏹、万慎	卷 54 杂志类·方言	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四川泸州叙永
68	民国	乐至县志又续	杨祖唐、蒋德勋	卷 3 风俗志·俗尚	民国 18 年刻本	四川资阳乐至
69	民国	盐丰县志	郭燮熙	卷 12 杂类志·旧习·言语	民国 13 年铅印本	云南楚雄大姚
70	民国	大理县志稿	周宗麟	第四册社交部·社会教育·方言	民国 6 年铅印本	云南大理大理
71	宣统	续蒙自县志	佚名	卷 12 杂志·轶事	上海古籍书店,1961 年影印本	云南红河蒙自
72	民国	镇康县志初稿	纳汝珍、蒋世芳	第四册第十六方言	民国 25 年稿本	云南临沧永德
73	民国	绥江县志	刘承功、钟灵	卷 4 方言	民国 36 年石印本	云南昭通绥江
74	民国	开化县志稿	汪振国、龚壮甫	卷 6 风俗志·方言	民国 38 年抄本	浙江衢州开化

综上所述，目前可见的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共 1035 种，其中南宋 1 种、明代 36 种、清代 503 种、民国 495 种，覆盖除西藏及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 30 个现行省份，详见表 2。

表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目汇总表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总计
时代	宋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1
	明	1	-	2	1	-	-	-	-	5	13	1	1	-	1	-	-	-	-	6	1	3	-	-	-	-	1	-	-	-	-	36
	清	1	2	27	13	1	2	1	-	41	55	26	16	12	12	5	12	15	54	84	26	17	5	13	14	11	22	14	-	1	1	503
	民	6	3	66	19	6	17	13	6	16	25	16	6	10	6	20	24	6	10	28	56	5	9	33	14	17	18	35	1	4	-	495
总计		8	5	95	33	7	19	14	6	62	94	43	23	22	19	25	36	21	64	118	83	25	14	46	28	28	41	49	1	5	1	1035

这些方志多为刻本、抄本、铅印本等，半叶行数从几行到十几行不等，行字数从十几字到三十几字不等。当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篇幅不足半叶时，亦以半叶计；少量旧志在 1949 年后出版，采用现代编页方式的折算成叶数，如此在 1035 种旧志中统计得 5452 叶，详见表 3。若以半叶 10 行，行 20 字，不特别计算双行小字的情况作保守估计，则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总字数约在 218 万字以上。我们增补的 74 种旧志，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共 453 叶，约 18 万字。

表 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收录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叶数表

时期 省份	宋	明	清	民	总计
北京	-	2	51.5	66	119.5
天津	-	-	5.5	18	23.5
河北	-	1	138.5	593.5	733
山西	-	0.5	28	265.5	294
内蒙古	-	-	1	64.5	65.5
辽宁	-	-	1.5	108.5	110
吉林	-	-	4	27.5	31.5
黑龙江	-	-	-	3.5	3.5
上海	-	3	120	95.5	218.5
江苏	0.5	22	150.5	262	435
浙江	-	0.5	218	680.5	899
安徽	-	0.5	56	160	216.5
福建	-	-	13	54.5	67.5
江西	-	1.5	12	120	133.5
山东	-	-	6	223	229
河南	-	-	29.5	73	102.5

(续表)

时期 省份	宋	明	清	民	总计
湖北	—	—	12	101	113
湖南	—	—	104.5	39.5	144
广东	—	4	249.5	186.5	440
广西	—	0.5	23.5	113.5	137.5
海南	—	1.5	11	7	19.5
重庆	—	—	10	152	162
四川	—	—	63.5	175.5	239
贵州	—	—	32.5	34.5	67
云南	—	—	6	28	34
陕西	—	0.5	36	83	119.5
甘肃	—	—	18.5	264	282.5
青海	—	—	—	1	1
宁夏	—	—	2	8.5	10.5
新疆	—	—	0.5	—	0.5
总计	0.5	37.5	1404.5	4009.5	5452

据表 2、表 3 并结合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其他具体情况作整体分析，笔者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自南宋以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和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皆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者均在民国时期急剧增长。在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上，清代在 276 年里产生 503 种，而民国在短短 38 年内就产生 495 种，几与清代持平；在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上，民国的 4009.5 叶则远超清代的 1404.5 叶。

民国时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数量的显著增加，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先就河北的情况对影响方言入志的政治因素略作讨论。河北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仅次于广东，多达 95 种，其中明代仅 2 种，清代增至 27 种，民国则激增至 66 种，约占河北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旧志总数的 70%。此等显著增长与河北省政府在民国 20 年（1931）成立通志馆，并向各县下发政令征求志料以便修纂《河北通志》之事有关。随同政令附发的还有县志门类，其中就包括方言一类。^① 民国《河北通志稿》的方言部分约完成于民国 23 年。据统计，仅在民国 20 年至民国 23 年的 4 年间，河北就产生 38 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这占据河北民国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总数的 58%。这些方志皆为县志，有 15 种以“志料”命名，其中大部

^① 张仁鑫《民国二十年重修霸县志序》：“（民国）二十年三月奉河北省政府令，征集各县志料，并附发县志门类。……爰召集行政会议，决定仍照所征门类，继后续修。”民国《霸县新志》卷 4“风土”下设“方言”，参见民国《霸县新志》，民国 23 年（1934）铅印本，第 2 页。

分在序中交待乃应河北省通志馆征集志料之命而修。这些方志中的 32 种统一将方言归置在“风土”下,与铅印本《河北通志稿目录》对方言的归置方式一致。^①而且,这些方志大多分称谓、名物、动作、情状、天文、地理等类记录方言,由此推测当年可能还规定了方言一类的编纂细目。经考察,广西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与河北相同,限于篇幅,不作详述。可见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推动使得方言入志的实践更为高效、统一、规范,是影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数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篇幅的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民国时期出现较多方言独立成卷的方志。据统计,方言独立成卷的旧志共 86 种,其中清代虽已见 14 种,但篇幅仅有 469 叶;到民国则激增至 72 种,篇幅更是跃升至 2555 叶,约占民国篇幅总量的 64%,成为推动篇幅剧增的主导因素。浙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仅有 43 种,篇幅却达 899 叶,位居全国首位,其关键就在于仅民国《鄞县通志》一种方言独立成卷的方志就贡献了 402 叶的篇幅。^②旧志方言独立成卷具备多重意义:首先,它直接促进了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篇幅的显著扩大,为后世留下丰富而详尽的宝贵语料;其次,独立成卷的编排方式更有利于方言资料的科学、系统整理,提升了编纂质量;最后,它反映了民国方志编纂理念的变化,方言不再只是作为风俗的附目而被简略提及,还可被视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设篇卷进行大举书写,从而在方志中占据更为显要的地位。

第二,历代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内容主体皆是词汇和语音,二者的内容占比大概为 6:3。有 584 种旧志在方言内容的开头或结尾处载有当地方言的概况资料,其篇幅近 500 叶;还有 54 种旧志收录有俗字资料,其篇幅近 181 叶,二者占内容总量的一成左右。旧志汉语方言资料多为单个方言词的音义记录,少语篇资料,仅同治《于都县志》^③、民国《顺义县志》^④、民国《江苏省地志》^⑤、民国《云霄县志》^⑥ 4 种可见成段的方言记录,除此之外还偶见少许虚词资料,因此语法方面的记录甚少。这与我国传统小学于语法研究上的薄弱点相一致。历代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所载方言词汇的社会覆盖面很广,包括称谓、人体、动作、情状、动物、植物、器物、宫室、天文、地理、时间、农业、商业、饮食、风俗等内容,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亲属称谓一类。下文提及可在 441 种旧志中整理出 972 条表示“父亲”义的汉语方言词,这说明至少有 441 种方志载有亲属称谓词,约占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旧志总数的 43%。

第三,江南、华南以及京津冀是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最为丰富的 3 个地区。江南地区江浙沪皖四省的方志总量有 222 种,华南地区粤桂琼三省的方志总量有 226 种,均占全国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总量的 20% 左右,二者的篇幅分别达到 1768 叶和 597 叶,各自占据全国篇幅总量的 32% 和 11% 左右。京津冀地区的方志总量有 108 种,占全国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总量的 10% 左右,篇幅达 876 叶,约占全国篇幅总量的 11%。以上 3 个地区各自内部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在方言上相近,适合将各自占有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联合作考察。

① 参见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民国《河北通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年,第 2964 页。

② 参见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1951 年铅印本,第 2651—3455 页。

③ 参见同治《于都县志》卷 13《艺文志·邑侯颜公香陔先生劝民息讼俚语》,光绪二十九年(1903)补刻本,第 85—87 页。

④ 参见民国《顺义县志》卷 12《风土志·方言·附萧贵卿拉杂的土话》,民国 22 年(1933)铅印本,第 23—25 页。

⑤ 参见民国《江苏省地志》第 3 编《人文志·住民及文化·语言》,民国 25 年铅印本,第 105—109 页。

⑥ 参见民国《云霄县志》卷 4《地理志下·方言与歌谣》,民国 36 年铅印本,第 8—10 页。

京津冀地区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数量有近九成来自河北,而河北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这点上文已论及,此不赘述。江南、华南地区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丰富的原因有其历史根源,皆可追溯至南宋的范成大。范成大是方言入志体例的开创者,其所撰苏州方志《吴郡志》^①及笔记著作《桂海虞衡志》^②载有方言及俗字,这直接促成江南、华南两地较早形成载录方言的方志编纂传统。明代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集中在江南、华南两地便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明代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共36种,其中江南地区有20种,华南地区有10种,两地约占明代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总数的83%。其中江苏的明代方志数量最多,有13种,且有7种出自苏州地区。而且,这些方志大多数与《吴郡志》《桂海虞衡志》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如洪武《苏州府志》^③、弘治《吴江志》^④、嘉靖《广西通志》^⑤、嘉靖《广东通志初稿》^⑥等。方言入志体例起源早的江南、华南两地,经过历代的发展,最终累积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都十分可观。值得一提的是,华南地区还有近百种旧志收录民族语言资料,其数量亦不少。

第四,大多数省份都是民国时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多于清代,但上海、江苏、湖南、广东却出现民国时期数量锐减的情况。具体说来,上海清代有41种,民国仅16种;江苏清代有55种,民国仅25种;湖南清代有54种,民国仅10种;广东清代有84种,民国仅28种。这些省份民国时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较之同时期其他省份的数量也不算少,之所以比各自省份的清代时期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在民国时期纂修的方志数量远少于清代。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统计,上海现存清代方志223种,而民国仅101种;江苏现存清代方志447种,而民国仅168种;湖南现存清代方志346种,而民国仅63种;广东现存清代方志376种,而民国仅49种。^⑦可见地域方志总数的多寡有时也会影响地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的数量。

第五,方言撰者确切可考的旧志共123种,约占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旧志总数的12%。这些撰者不乏黄钊、黄炎培、贾恩绂、王树枏、陈衍、钱基博、李鼎超、黎锦熙、马瀛等名家,多为本地人,如民国《盐山新志》的方言部分就为邑人贾恩绂所撰^⑧。也有在此仕宦、修志的外地人,如光绪《浪穹县志略》的方言部分为时任浪穹知县的云南昆明人周沆所撰^⑨;又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本湖南湘潭人,但在抗战时期编写陕西省《洛川县志》^⑩、《同官县志》^⑪、《宜川县志》^⑫3种“方言谣谚志”。旧志方言撰者的确定,大多依赖于方言部分或方言所在卷卷首的

① 参见范成大纂,汪泰亨增订:绍定《吴郡志》卷2《风俗》,民国3年(1914)影刻宋本,第9页。

② 参见范成大撰,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杂志《俗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1—172页。

③ 参见洪武《苏州府志》卷16《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32号,第632页。

④ 参见弘治《吴江志》卷6《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446号,第233—234页。

⑤ 参见嘉靖《广西通志》卷17《风俗·方言》,嘉靖十年(1531)刻本,第12页。

⑥ 参见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18《风俗·方言》,嘉靖十四年刻本,第15页。

⑦ 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⑧ 参见民国《盐山新志》卷24《故实略·谣俗篇上·方言》,民国5年(1916)铅活字本,第1—56页。

⑨ 参见光绪《浪穹县志略》卷13《杂志·种人·方言》,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第3页。

⑩ 参见民国《洛川县志》卷24《方言谣谚志》,民国33年铅印本,第1—12页。

⑪ 参见民国《同官县志》卷27《方言谣谚志》,民国33年铅印本,第1—22页。

⑫ 参见民国《宜川县志》卷24《方言谣谚志》,民国33年铅印本,第1—12页。

署名。依据这样的方式确定方言撰者的旧志有 78 种,其中通志 11 种、府志 11 种、县志 56 种。而乡镇志多为私人所撰,撰者信息一般明确,乡土志的编写者一般也为单人且明确,故大部分的乡镇志和乡土志的方言撰者与方志撰者重合。据此,可以确定方言撰者的乡镇志有 35 种,乡土志有 10 种,总计 45 种,约占方言撰者明确的旧志总数的 37%。上海拥有方言撰者明确的旧志数量最多,共 23 种,其中就有 15 种乡镇志和 4 种乡土志。旧志方言撰者的署名,有助于确认资料的权属和撰者的责任,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追溯方言资料的来源和编纂过程,从而评估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旧志汉语方言撰者的署名率比较低,这与方志编纂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有关,也与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简略者多,不便单独署名有关。

二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时代分布特征

方志语言资料一般可认定是对方志修纂时期地方日常语言使用状况的记录,故其语料时间基本等同于方志文献的修纂时间。下面以时间为维度,对旧志汉语方言资料作所属朝代、年号、世纪三方面的考察。

从旧志的朝代分布上看: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始于南宋,仅绍定《吴郡志》1 种。该志卷 2“风俗”记录吴语“来”的读音及“罢休”一词。^①到了明代,方志修撰者开始有意识地将方言词语、方音、俗语、谚语、歌谣等内容纳入方志的框架体系,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渐多。清代是方志开始大规模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时期,民国发展至顶峰。至于具体的朝代数量分布,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从略。

从旧志所属年号分布上看:在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 1035 种旧志中,有南宋绍定 1 种;明代洪武 1 种,弘治 2 种,正德 4 种,嘉靖 11 种,万历 13 种,天启 1 种,崇祯 4 种;清代顺治 1 种,康熙 57 种,雍正 11 种,乾隆 110 种,嘉庆 46 种,道光 61 种,咸丰 12 种,同治 58 种,光绪 133 种,宣统 14 种;民国 495 种。据图 1 可知,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清康熙之前呈现低增长的状态;康熙年间出现增长的第一个节点,其次是乾隆年间,光绪年间则处于清代增长幅度的最高节点^②;民国时期的增长幅度最大,在短短 38 年里就有 495 种,与自南宋绍定到清代宣统近 700 年 540 种的数量所差无几,占总数的近半。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在清代首次得到大幅度的增长,这与康、乾、嘉三朝大力倡导“盛世修志”的政策不无关系。至于为何到了清代,方言资料才得以大量入志,这应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清代小学昌盛,且有不少清代小学大家参与方志的编纂应有一定关系。民国时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这除与上文提及的政治因素有关外,还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及“西学东渐”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清末民初的一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缘于文化科学的落后,而文化科学的落后则是因为中国语言文字“言文分离”的特性及汉字的不易习得,影响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通过借鉴欧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在社会及政府层面先后掀起了汉字改革运动、“读音统一”“国语运动”等,

① 参见范成大撰,汪泰亨增订:绍定《吴郡志》卷 2《风俗》,第 9 页。

② 对清代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数量的分析,在此仅以图中所呈现的数据样态为依据,实际情况还应考虑皇帝在位时长这一因素。如康熙帝、乾隆帝在位时间分别为 60 年、61 年,各自数量为 57 种、110 种,而咸丰帝在位仅 11 年,有 12 种,同治帝在位仅 13 年,就有 58 种,如果按比例换算,咸丰、同治时期的数量并不比康熙、乾隆时期少,甚至更多。应该说,康熙以后,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一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

成立“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等组织，多次开展方言调查活动，颁发《注音符号总表》《全国方音注音符号总表草案》等语言政策文件。这自然也影响到方志方言编纂。如清末学人孙锦标撰写《南通方言疏证》的缘故，即因其师顾甦谷在晚年意识到“方今东西强国，所以进步趑趄者，以其文字语言能合而为一也。余忆修志时，略于识小，故方言一类，因陋就简，未遑抉剔，子竟之可乎”^①？因此嘱托弟子孙锦标对其早年所编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中的方言部分进行修订完善。又如民国时期的一些语言学者曾亲自参与方志方言的编写工作，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著有《方志今议》^②，为方志方言提供了科学的编写范式，还着手编写多种方志中的方言谣谚志。再如民国时期有56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采用注音字母为方言注音，还有7种采用了国标音标，5种采用了罗马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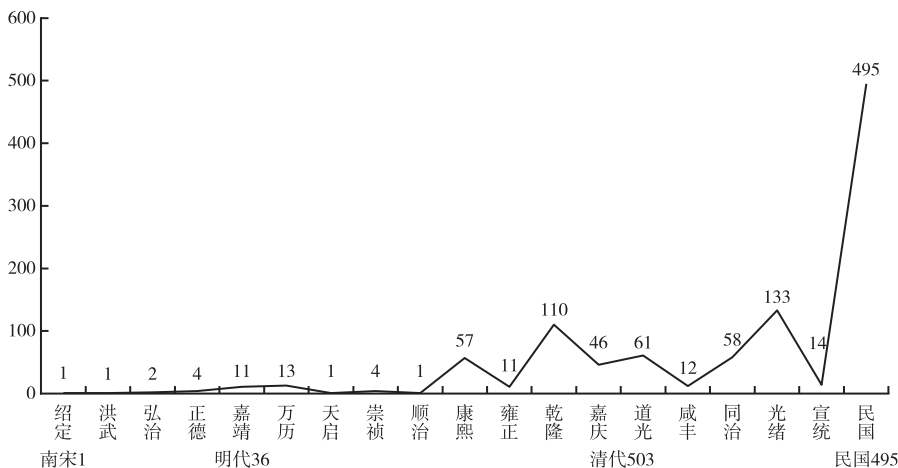


图1 各朝年号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

从旧志的世纪分布上看：据图2可知，在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1035种旧志中，有12世纪1种，14世纪1种，15世纪1种，16世纪19种，17世纪59种，18世纪137种，19世纪269种，20世纪548种。可以看到，从12世纪末至15世纪，在300年左右的时间里仅出现绍定《吴郡志》^③、洪武《苏州府志》^④、弘治《吴江志》^⑤3种江苏苏州地区的方志。上述3种方志所记内容简略因袭，都仅有0.5叶的篇幅，故可将这段时期与16世纪归并为一期，视作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萌芽阶段。17、18世纪大致对应清康、雍、乾三朝，这一时期的方志汉语方言资料较之萌芽阶段，在数量上得到较大提升，达到196种，也出现较为详细的方言记录，如康熙《嘉定县志》^⑥、乾隆《河南府志》^⑦、雍正《陕西通志》^⑧的篇幅分达到11叶、9叶、7叶。不过，这

① 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识语”，翰墨林书局，1913年，第1页。

② 参见黎锦熙：《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92—97页。

③ 参见范成大撰，汪泰亨增订：绍定《吴郡志》卷2《风俗》，第9页。

④ 参见洪武《苏州府志》卷16《风俗》，第632页。

⑤ 参见弘治《吴江志》卷6《风俗》，第233—234页。

⑥ 参见康熙《嘉定县志》卷4《风俗·方言》，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无页码。

⑦ 参见乾隆《河南府志》卷26《礼俗志·方言》，同治六年（1867）重校补刻本，第15—22页。

⑧ 参见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方言》，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第25—32页。

一时期的汉语方言资料篇幅未滿 1 叶的方志高达 127 种, 占该时期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方志总数的 65%, 可见该时期的方言记录整体还是偏向简略。因此, 17、18 世纪是方志汉语方言资料的发展阶段。19、20 世纪大致对应清嘉庆至民国时期, 此时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在数量上达到历史最高点, 在篇幅、地域覆盖面、记录方法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故而是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繁荣阶段。如民国《鄞县通志》方言部分的篇幅高达 402 叶, 分音读、俗名、谚语、谣歌 4 个部分, 用注音符号注音, 内容科学详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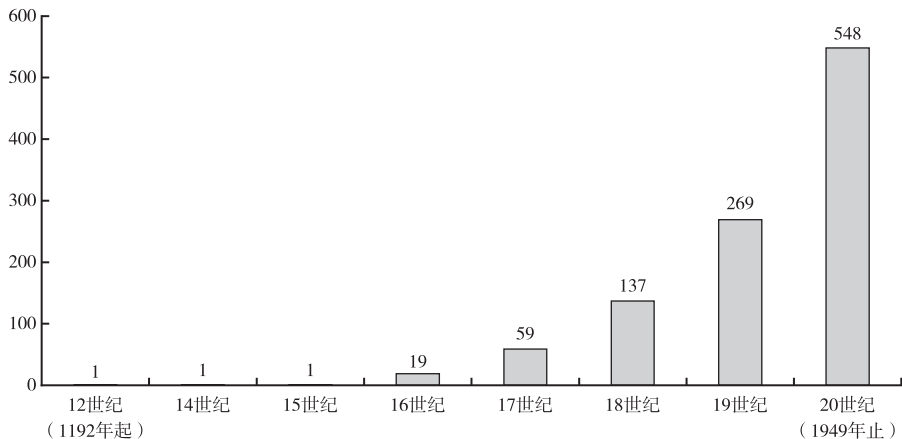


图2 12至20世纪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方志数量

综上可知, 萌芽阶段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过少, 可在探究方言入志体例的源起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若从汉语史研究的立场出发, 其语料价值并不能与之后的发展、繁荣阶段相提并论。因此,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语料时代判定问题宜作以下分析: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主体语料所属时代宜限定在清康熙至民国时期, 即约自公元 17 世纪中期至 1949 年, 前后 300 年左右的时间。而具体到旧志收录的某个方言词, 其语料所属时代则需在主体语料所代表的时代框架下,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伸缩考察。如下文所举表示“父亲”义的旧志汉语方言词的语料时代, 就只能涵盖 18—20 世纪中叶, 250 年左右的时间。

三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地域分布特征

方志属于地方文献, 所载皆为一地之事物, 所记之语言资料亦为该地所有。因此, 方志语言资料的地域归属, 等同于方志文献的地域归属。下面以空间为维度, 对旧志汉语方言资料作省份分布、行政区划层级分布、对应今行政区划层级分布等方面的考察。

从旧志的省份分布上看: 据表 2 可知, 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几乎遍布全国, 仅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未见。在各省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上, 广东居首, 有 118 种, 河北、江苏、广西次之, 分别有 95 种、94 种、83 种, 湖南、上海、甘肃再次之, 分别有 64 种、62 种、49 种; 地处边疆的省份数量最少^②, 如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内蒙古分别仅有 1 种、1

① 参见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 第 2651—3455 页。

② 北京、天津数量也少, 但这与其直辖市的行政等级属性有关。

种、5 种、6 种、7 种。但据表 3 所示各省所占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情况来看，地处边疆的省份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仍是最少的，可篇幅居前的省份情况却有所变化。篇幅最多的省份是在旧志数量榜上无名的浙江，达 899 叶，河北次之，达 733 叶，广东、江苏再次之，分别达 440 叶、435 叶。而旧志数量靠前的广西，其篇幅仅 137.5 叶。另外湖南有 144 叶、上海有 219.5 叶、甘肃有 282.5 叶，其篇幅皆不与其占有的旧志数量相匹配。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各省占有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越多，其篇幅也会得到相应的增长，但这并不绝对。广西的情况主要与其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旧志方言记录了众多民族语言资料有关，而其余省份的情况则如上文所提及的，方言入志能否借助政府政策的推动、其体例起源的早晚、某时期旧志纂修总数的多少等皆会影响各省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旧志数量的增长，而方言是否独立成卷则成为影响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篇幅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旧志的行政区划层级分布上看：在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 1035 种旧志中，有通志 37 种（通志 26 种、省志 8 种、乡土志 3 种）、府志 96 种（府志 79 种、市志 13 种、乡土志 2 种，关镇志 2 种）、县志 852 种（县志 839 种、山志 1 种、乡土志 12 种）、乡镇志 50 种（乡镇志 49 种、乡土志 1 种）。据表 4 可知，县志的数量在历代皆占据主体地位，其总量约占收录汉语方言资料旧志总数的 82%。县志收录的汉语方言资料篇幅同样占据主体地位，共有 4197 叶，约占篇幅总数的 77%。县级行政区划从古至今都是基础行政区划单位，数量远超省、府，相应的县志数量自然最多。虽然乡镇的数量多于县，但乡镇志往往集中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为私家著述，故数量有限。据表 4 还可知，在民国时期，府志、乡镇志的数量皆有所下降，但纂修难度更大的通志在数量上却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通志在明代仅 2 种，清代有 14 种，民国升至 21 种。这其中的原因仍与政府政策的推动有关。民国初期，有些省份已经开始通志的编修工作，如黑龙江、浙江、广东、福建等皆成立通志局；民国 6 年（1917），北洋政府下令各地纂修方志；民国 16 年，国民政府倡修方志，并在民国 18 年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设立通志馆，根据规定纂修通志。在官方行政力量的持续推动下，民国纂修的通志数量高达 26 种^①，某些省份如黑龙江甚至结束了省无通志的历史。^②虽然目前未见民国官方规定方言入志的直接材料，但就民国方志方言资料的整体情况看，方言入志已成为民国方志编纂的大趋势。因此，在 26 种民国现存通志中，就有 21 种收录汉语方言资料。

表 4 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类型数量表

方志类型		通志	府志	县志	乡镇志
时代	南宋	0	1	0	0
	明代	2	11	23	0
	清代	14	68	388	33
	民国	21	16	441	17
总 计		37	96	852	50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民国 22 年（1933）年铅印出版的《黑龙江志稿》是黑龙江省的第一部通志。

从旧志现今对应的行政区划层级分布上看：仅就县一级而言，可得现行区县 593 个^①，分置于除西藏、新疆、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 29 个现行省份，详见表 5。其中数量在 50 个以上的有 3 个省，分别是河北（68 个）、广东（50 个）、广西（50 个）；数量在 10—38 个之间的有 18 个省，如湖南（38 个）、四川（38 个）、甘肃（37 个）等；剩下的 8 个省数量皆在 10 个以下，如上海（9 个）、北京（4 个）、青海（1 个）等。参照表 2 可知，各省现今对应的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基本上与各省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成正比，只上海和江苏例外。上海和江苏各自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都很多，分别有 62 种和 94 种，但各自占有的现今对应的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都较少，分别只有 9 个和 19 个。这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上海和江苏各自占有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乡镇志比较多，分别有 20 种和 16 种；二、上海和江苏现今领辖的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皆较少，分别是 16 个和 95 个^②；三、上海和江苏的方志修纂事业发达，一地频繁修志且都载录方言的现象多见，如《江阴县志》从明弘治到清光绪期间共修 7 次，《上海县志》从明嘉靖到民国期间共修 8 次。如此也就易解释为何是河北今区县数量最多，因为河北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现今领辖的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皆居全国前列，且又不见乡镇志，少有一地频繁修志且都载录方言的现象。

表 5 现今各级行政区划占有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表

行政 层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总计
省	-	-	1	1	-	1	1	1	-	1	1	1	1	1	-	1	-	1	1	1	-	-	1	1	1	1	1	-	-	-	19
市	1	1	2	-	3	1	1	-	1	6	1	2	3	3	1	3	2	4	8	7	1	1	3	2	1	2	-	-	1	1	62
县	4	3	68	24	5	14	10	5	9	19	27	12	15	12	19	26	16	38	50	50	9	10	38	20	23	25	37	1	4	-	593
乡镇	1	-	-	-	-	-	-	-	20	14	4	-	-	-	-	-	-	-	3	-	-	-	-	-	1	-	1	-	-	-	44

由上不难发现，旧志汉语方言资料以乡镇为最小的方言调查单位。这类乡镇志主要出现在清代、民国时期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其方言记载大多较为简略，但也有较为细致者，如民国《枞茶史料初集》所载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达 47 叶。^③ 而数量最多的方言调查单位是县。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常以县区为单位布点，“在东南方言地区，如近几十年有撤县或设县情况的，设点时一般以清代的行政区划为准”，因为“明清时代的府县与汉语方言的分布具有密切的关系”^④。可见明清民国时期府县志收录的方言资料，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县志方言资

① 若该县不同时期的方志都收录汉语方言资料，也仅作 1 个县计算，下同。古今行政区划辖区往往不能完全吻合，时有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辖区对应当今的多个行政区划或多个行政区划的部分辖区的情况，对此，我们一般选取对应的今行政区划之大者。如康熙《延绥镇志》，清康熙时的延绥镇辖区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榆林市、延安市，甘肃庆阳市，我们将其今对应区域定为陕西榆林市。

② 河北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为 95 种，与江苏相当，但其现今领辖的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有 167 个。这样看来，江苏现今领辖的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是比较少的。

③ 参见民国《枞茶史料初集》“枞茶方言一斑”“枞茶方言补”，民国 25 年（1936）铅印本，第 155—250 页。

④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前言”，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 页。

料,在方言调查单位的设置上,竟有与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要求相一致的科学性。也就是说,上文统计所得的593个县区,对应产生的是593份清代民国时期以县为单位开展调查所得的方言调查报告。

至此我们可对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4个特点进行总结:

第一,数量多。目前可见的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共1035种,每种方志所记方言资料篇幅虽长短不一,但库藏总量丰富。

第二,地域覆盖面广。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其余30个省份皆有分布。

第三,时地标记明确。方志所指地域明确这点自不必说,方志的编纂时间也几乎明确,故方志所载方言资料的时代、地域信息在一般情况下亦无可疑之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所属时代主要集中在清康熙至民国时期,3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既是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交接过渡期,也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前期,属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第四,语料调查大部分以县为单位进行,科学合理。上文统计所得的593个现行县区,可视作593份清代民国时期的县区方言调查报告。

四 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方言地理学价值

方言地理学,也称词汇地理学、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等,以广泛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描写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并结合人文或自然地理因素进行解释,从而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①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一般认为在20世纪前期由林语堂、刘复、岑麟祥、赵元任、贺登崧等人引入中国,应用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时至今日,方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欣欣向荣,涌现诸如《中国语言地图集》^②、《汉语方言地图集》^③等众多成果。但纵观现有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聚焦的是现代汉语方言,对于历史汉语方言则用力较少。目前可见的与历史汉语方言相关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大都是依据汉代扬雄《方言》绘制汉代方言分区图和方言特征图,研究汉代方言的分区,如Paul L-M. Serruys^④、丁启阵^⑤、松江崇^⑥、李恕豪^⑦等;再就是周振鹤、游汝杰利用旧志方言资料考察16—19世纪上海地区的方言地理状况,并绘制方言区划图。^⑧研究资料的不足,是阻碍方言地理学研究在历史汉语方言领域发展的首要原因。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可凭借田野调查获取准确、全面的语言材料,而历史汉语方言研究往往只能借助片面又很难得到验证的文献记载。中国传统语言学重文轻言,重雅言轻方言,使得历史汉语方言记录较少,更遑论全面的、有明确时地标记的可供方言地理学研究之用的方言资料。因此,虽然陈章太等人早就有“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应当绘制一

① 参见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方言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③ 参见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 参见Paul L-M. Serruys,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195—236.

⑤ 参见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39—242页。

⑥ 参见[日]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日]远藤光晓编:《与中国相关言语地理和人文自然地理》研究成果报告书第4分册,1999年。

⑦ 参见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⑧ 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地区16—19世纪方言地理》,第279—292页。

部汉语方言历史地图集”的倡议，但同时也承认“这项工作很难，要对汉语方言史进行大量的研究，并有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还要有专门机构组织实施，恐怕这项工作只能留待以后去完成了”^①。

上述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拥有的四个特点：数量多、地域覆盖面广、时地标记明确、以县为主的调查单位设置科学合理，足以说明它已具备作方言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条件。以表示“父亲”义的旧志汉语方言词为例，若只考虑面称，不计背称，则可在 441 种方志中整理出 972 个词条。继而根据词形（主要是词根，不考虑重叠、修饰成分、语音演变等因素），将其分成爷、爹、父、爸、伯叔、大、哥、官、其他等 9 个大类。再依据整理原则，归并同一方志中某些词形不同但实为一体的词条，剔除某些通志所记方言词通行区域过大或直引府县志的词条后，整理出表示“父亲”义的旧志汉语方言词 818 条。这些词从朝代分布上看，有明代 20 条、清代 360 条、民国 438 条；从世纪分布上看，有 16 世纪 12 条、17 世纪 30 条、18 世纪 83 条、19 世纪 221 条、20 世纪 472 条。旧志收录的表示“父亲”义的汉语方言词，在时代上基本涵盖 18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约 250 年的时间；在地域上则包括了除西藏、黑龙江、新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 28 个现行省份的 356 个县区，几乎遍布全国，详见表 6。同一地域不同时期方志载录的方言存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为避繁琐，这些词在地图上的呈现都只保留 1 条数据。这样的词计有 163 条，因此最终呈现在方言地图上的方言词为 655 条。据此绘制清代民国时期表示“父亲”义的汉语方言词汇地图后，就可对该词在清代民国时期的地理分布面貌进行描写，并将其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作对比，探寻该词演变的规律和机制；还可结合表示“父亲”义系列词的历史演变情况进行讨论，进而将父系长辈亲属称谓的其他词，如表示“祖父”“叔父”“伯父”义等词联合起来讨论，用一种更为全面、宏观的视角考察亲属称谓词各自的发展演变，及之间的接触影响等问题。

表 6 表示“父亲”义的旧志汉语方言词的基本情况表

资料 类型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总计
方志	4	4	53	12	2	3	2	-	25	16	17	9	5	7	8	24	7	41	64	31	4	5	21	15	4	26	28	1	3	-	441
区县	3	3	45	11	3	3	2	-	16	14	14	7	5	5	8	20	8	34	37	23	2	4	21	17	5	19	23	1	3	-	356
词条	5	6	81	14	3	4	3	-	45	23	25	17	6	9	14	45	18	69	155	68	13	6	63	27	5	46	44	1	3	-	818

由上可知，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方言地理学价值，在于可用来绘制方言地图，描写清代民国时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分布状况，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方言的不同，探寻汉语方言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同时，它亦可为汉语方言的分类与分区、方言接触等研究提供助力，特别是旧志所载当地方言的概况资料，涉及当地方言的音韵特点、分类、分区、来源、方言接触等内容，可作为此类研究的直接参考。如同治《宜昌府志》：“郡虽处楚之西偏，而语言朗彻，颇似中原雅音，四声中惟入声多有读作平声者。城内外口音与荆郡相似，东湖乡村音稍浊，而语言无异。兴山则与鄖阳

① 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 年第 3 期。

口音相近，归、巴则与川音相近，长阳声音、言语与郡城不大异，鹤峰、长乐则大概似郡城，而尾音兼湖南。”^①

结 语

上文以收录汉语方言资料的旧志数量和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篇幅为立足点，对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数量作清算，由此揭示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时代与地域分布特征，明晰这批资料的语料代表时间，并阐述其方言地理学价值。当然，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价值不止于此。它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语料富矿，亦有助于辞书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移民史等其他学科的研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旧志汉语方言资料也有其缺陷。对此，游汝杰总结有四点：一是方志方言内容完全承袭前志或他志，不具个性，甚至以讹承讹。二是收词标准不明确、不统一。三是直音、反切的注音方法不科学，对语音的描写侧重于语感，不够精确。四是视口语为鄙俚，视音变为音误。^② 以上四点是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一般性缺陷，若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最大的问题则是资料的均一性无法得到保证。首先是地域分布不均。某些地区的旧志汉语方言资料数量有限，地图上就出现空白，对于这一区域历史上的方言分布情况及其他相关问题就无从考察。如福建、江西、山东三地的方志汉语方言资料过少，这三地在现代形成的方言特征，上溯至清至民国时期的情形如何，就只能付之阙如。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这一缺陷可借助其他同期方言资料进行弥补。明清民国时期产生的方言著作、戏曲、白话小说、传教士编写的汉语方言教材、词典和《圣经》译本等，都对当时各地的方言现象进行记录，是一批数量与质量皆可宝贵的方言文献。近年来这些资料的汇编成果颇丰，如马重奇《明清以来闽方文献集成》汇集明清以来78种闽方文献^③，若能将这些文献记录的方言资料与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结合利用，相信旧志汉语方言资料在福建地区均一性差的问题将会因之大为改观。其次是语料类型分布不均。旧志汉语方言资料的主体是词汇资料，语音资料次之，语法资料较少。因此，将旧志汉语方言资料作为绘制清代民国时期的词汇和语音特征分布图的材料最为理想。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方言》，同治五年（1866）刻本，第23—24页。

② 参见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

③ 参见马重奇主编：《明清以来闽方文献集成》1—6辑，商务印书馆，2022—2023年。